

0879

社会主义经济中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上

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文章选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文章选编

0889

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 与市场的关系

(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料室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资料室 编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资料室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编 者 的 话

根据广大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的要求，我们把一九七九年四月在无锡举行的关于价值规律作用问题讨论会中有关计划与市场关系方面的文章，选编成上、下两册出版。

本书选编的，除了薛暮桥同志在讨论会上所作的开幕词和闭幕词外，主要是论述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生产和流通中的作用、有计划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的关系、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途径以及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管理等方面的文章。

为了使读者了解这次讨论会的概貌，我们还把会议筹备情况说明以及讨论情况和提出的问题作为附录，编入本书。

在选编过程中，我们对一些文章的个别地方稍有删改。

一九七九年七月

目 录

坚持百家争鸣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关于价值规律作用问题讨论会开幕词……………薛暮桥(1)

再接再厉 乘胜前进

——关于价值规律作用问题讨论会闭幕词……………薛暮桥(7)

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管理……………薛暮桥(15)

关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及其它……………骆耕漠(44)

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

关系……………刘国光 赵人伟(53)

我国全民所有制经济计划管理体制存在的

问题和改革方向……………何建章(74)

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与市场性相结合的

几个理论问题……………孙尚清 陈吉元 张卓元(96)

再论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与市场性

相结合……………孙尚清 陈吉元 张卓元(126)

价值规律、市场机制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唐宗焜(149)

有计划发展规律调节作用与价值规律调节作用

……………黄振奇(181)

略论计划规律和价值规律的关系……………宋养琰(196)

计划和市场相结合是我国经济管理改革的

基本途径……………刘成瑞 胡乃武 余广华(215)

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

的统一……………冯宝兴 万欣 张大简(236)

在统一计划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顾松年(251)

处理计划和市场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	骆禹名(265)
从我国社会条件出发,实行计划调节	
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徐景安(277)
生产资料供应应该是计划分配与市场销售	
相结合·····	施修霖(295)
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和市场·····	齐 风 赵振英(309)
论社会主义计划管理与利用市场机制·····	刘诗白(317)
试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	许柏年(335)
从农副产品的收购政策看计划调节	
和市场调节的关系·····	张致诚 王奇华(350)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几个问题·····	顾纪瑞(359)
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于祖尧(370)
谈谈怎样认识和利用社会主义市场	
的作用·····	骆禹名(404)

坚持百家争鸣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关于价值规律作用问题讨论会开幕词

薛暮桥

这个会议，是全国经济学界的一次重要的学术讨论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次讨论价值规律问题的盛大的会议。第一次大会是在上海召开的，时间是1959年4月，离现在刚刚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有十年是文化大革命，在座的同志大部分被林彪、“四人帮”剥夺了发言权。在粉碎“四人帮”后，学术界生机勃勃，大家可以讲话了。近一年来，开过几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讨论了许多重要的经济理论问题，对于林彪、“四人帮”散布的种种谬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很有成绩。我想，这次会议也一定能够开好。这次会议本来准备由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同志亲自来主持，他因为出国访问去了，不能来参加。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许涤新同志本来也准备来主持这次会议，前不久生病了，现在还住在医院里。如果最近病愈出院，仍想赶来参加这次会议。由于他们两人今天没有参加，所以我代替他们来致开幕词。

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是关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大问题。林彪、“四人帮”把我们的国民经济搞得混乱不堪，达到了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两年半整顿，

已经大大好转，所以三中全会号召全党全国人民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方面来。但是，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还存在着比例失调，还需要用一定的时间来进行调整，这样才能够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奠定巩固的基础。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还与四个现代化不相适应，我们必须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为四个现代化创造条件。

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如何充分利用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牵涉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的许多问题，所以有必要召开一次经济理论工作者的学术讨论会，澄清过去思想上的许多糊涂观念，提出新的见解，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参加这次讨论会的，有全国重要的经济理论研究机构，重要的经济院校和大学的经济系或经济学教研室，经济业务部门的研究机关，宣传机关和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人才济济，聚集一堂，可以说是一次“群英会”。这次讨论的问题都围绕着四个现代化，而以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为中心。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这一点是没有争论的。但是究竟如何进行计划管理，有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所以很有必要集合全国的人才，群策群力来研究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为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最近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个重要问题，对我们思想很有启发。科学社会主义本来是应当建立在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上的。我国底子薄，人口多，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还离现代化很远，在这样的基础上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实行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这是马克思所没有设想过的。我国现在的计划管理制度，基本上是五十年代初期从苏联学来的。当时，学了一些好的经验，也

学了一些不好的经验。有的经验，在苏联也不适合，同我国的情况就差得更远。我们要改革的，是那些不好的、不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东西。要改革，必须在理论上弄清一些问题。例如，我国的人民现在还有80%是农民，他们还在公有化水平很低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中生活。对于他们，如果不借助于价值规律，能实行计划管理吗？过去我们有一些时候用管理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办法来管理集体所有制经济，剥夺了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自主权，使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的损失。这二十年农业生产发展很慢，就不尊重价值规律有很大的关系。这个问题需要认真研究。

对全民所有制经济实行计划管理，怎样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很多同志指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同价值规律不是互相对立的。国家必须利用价值规律来促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有的同志认为，国家必须扩大企业的自主权，要它们对自己的经营成果享受一定的权利和担负一定的责任；国家计划的大部分应当是参考性的计划，企业可以参考这些指标来决定自己的经营管理方针，争取以最少的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国家则主要利用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即通过税收政策、价格政策、信贷政策等等，来引导企业更主动地执行国家计划。这里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还有许多其他同志提出各种宝贵的意见，这些都需要我们敞开思想，认真进行讨论和研究。

今天我只能提出问题，不可能也不必要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看法和方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应该让大家讨论。今天我想着重讲一个问题，即怎样开好这次会议，为此我想提出我们的会风，那就是学风问题。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整

风学习中曾经提出要整顿学风。那时候我们要反对的，是王明的教条主义学风，所以毛主席提倡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学风。以后，它成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这个传统，有一段时间，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粉碎“四人帮”以来，党中央多次提出要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特别是在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以后，这个传统又逐步得到恢复。最近我看了几篇为这次会议准备的论文，都是从实际出发来研究这个理论问题的。我们这次学术讨论会，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这基础上，我们还要很好地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作为学术讨论会，百家争鸣的学风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百家争鸣，就要坚持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承认有什么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以权压人的所谓“理论权威”。

我认为，1959年在上海召开的那次价值规律讨论会，会风是比较好的。那时候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对任何一种不同的意见，都没有打棍子，戴帽子，贯彻执行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凡是科学理论问题，任何人都不能凭自己的权力来作结论，包括党的领导者在内。去年在报上发表的毛泽东同志给李达同志的信，完全表现了平等待人的态度。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总的来说是本好书，但他答复几个同志的信，有不少武断的结论。结果有些结论做错了（如说价值规律对农产原料的生产不起调节作用，决不能把农业机械卖给集体农庄）。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为着篡党夺权，混淆理论是非，把许多同志的正确言论当作修正主义毒草来批。反之，张春桥、姚文元的两篇反党文章，却成为“经典”，里面许多谬论当时就有多人反对，但是不敢批评，不准批评，谁批谁就成了“反党分子”。那一段时间，

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被他们一扫而光，学术思想完全窒息了。

在粉碎“四人帮”后，我国的理论家发表了许多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也召开了好几次学术讨论会，成绩是巨大的。某些问题上有一些不同的观点，这种现象是必然会产生的，应该允许在报刊上、会议上自由讨论。这没有害处。真理愈辩愈明。而且是不是真理，归根到底要由社会实践来检验。真理有时在多数人手里，也有时在少数人手里。应当允许少数人发表不同的意见。

我希望在这一次会议中，大家能够畅所欲言，提出各种不同的意见，并且以同志的态度互相探讨。如果这次会议只有一种意见，一边倒，那我认为这次会议不是成功了，而是失败了。理论工作者应当敢于坚持真理，坚持自己的观点。在座有老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是受到批判的，我也曾批评过他。他在几年冤狱以后回到家中，就向同志宣布他继续坚持他过去的观点。尽管我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但我认为他这种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的风格，是我们应当学习的。

邓小平同志在一次会议的总结发言中讲到，我们的宣传工作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原则。这同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矛盾。只有贯彻执行百家争鸣的方针，才能更好地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艰巨任务。我们讲百家争鸣，是为了发展学术，使学术更好地为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通过贯彻执行百家争鸣方针，把学术界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献计献策，一定可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只有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才能

巩固党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更加鲜艳夺目。

会前有的同志问我，会上要讲些什么？我说，第一，开幕时候不讲观点，避免束缚大家的思想；第二，结束时候也不作结论。我只讲一个问题，就是百家争鸣。我希望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充分体现党的百家争鸣方针的大会。我们这一次会议的任务是，充分讨论在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管理中怎样充分利用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如何改进经济管理体制，应当在理论上作出较大的贡献。

祝会议取得圆满的结果。

再接再励 乘胜前进

——关于价值规律作用问题讨论会闭幕词

薛暮桥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达到了开幕时预期的要求。正如有一期简报中所说的：“会风和畅，百家争鸣”。我因为急于写书，没有能来参加大中小讨论会，只看了简报，昨天又看了大会秘书处所整理的综合报告，在讨论中大家提出了大大小小几十个问题，每个问题都有好几种不同的意见。可惜由于时间限制，这些问题不可能深入进行讨论，不同的意见也没有认真交锋，只打了一两个回合就不分胜负，鸣锣收兵。我看，讨论的问题还是太多了，兵力分散，所以不可能打歼灭战。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急待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多，开一次学术讨论会只能象“广交会”那样，把各人的货物都摆出来，任人选购。要进口成套设备，需要专门会谈。

在会议开始时候，我们几个发起单位讨论，鉴于以前有几次讨论会的经验，害怕会议受文化大革命时期“看风向”，“一边倒”的错误影响，所以我强调“三不主义”，孙冶方同志补充了另一方面，“五不怕”。目的都是一样，提倡百家争鸣。

听说这次会议在讨论某些问题的时候，虽然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各说各的，不交锋，象唱“三岔口”。我不知道是不

是受我的开幕词的影响。百家争鸣有个“争”字，“争”就要交锋。我提倡“三不主义”，是说不要一争就“上纲上线”，乱戴“修正主义”帽子，吓得别的人不敢为被批评者辩护，甚至被批评者也不敢把发言稿交出来，怕被别人揪住他的辫子不放。争还是需要争的，真理总是愈辩愈明，争的结果，可能是一方说服了另一方，更可能是争论双方都得到启发，发现了自己的弱点，增强了战斗力，下次再争时候，问题就步步深入。百家争鸣是科学文化发展的一条捷径。西洋史上希腊罗马时代是百家争鸣，文艺复兴时代也是百家争鸣，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我国春秋战国时代是百家争鸣，五四运动时代是百家争鸣，也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反之，中世纪教皇排斥“异端”，我国历代帝王也是利用孔孟之道排斥“异端”，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林彪、“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许多同志发言、写大字报到报纸上选抄几段。自以为很保险，结果现在要做检讨。我是最不会抄报纸的，没有自己的意见宁可不言。我看这一次许多同志的发言，都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很少顾虑。总的来说会风还是好的。

我上次说这一次讨论会是1959年大讨论会的继续。这两次讨论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贯彻执行了百家争鸣的方针。也有不同之点，就是理论结合实际，这一次比上一次有很大的进步。记得上次讨论中有一项热门货，什么是商品？当时说两种所有制之间的交换不是商品交换的是极少数，说百货商店出卖的消费品不是商品的人数比较多。《红旗》杂志上就发表了两种不同意见的文章，号召大家讨论。这在学术讨论上是有意义的，但对实际工作影响不大。尽管《红旗》杂志发表了这些消费品不是商品的文章，百货公司不会因此

减少一个顾客。这一次的讨论会就不同，对实际工作影响很大，所以中央许多经济部门都很关心，派了一些同志来参加这次会议。有些人是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的，有些人是来观察风向的。不管动机如何，业务部门是不能不关心这次理论讨论会了。上次讨论会来的很少，请他们也不来，我就是被大家请了才到会的。做实际工作的同志不关心理论，这是一个缺点。我们做理论工作的同志也应当检讨，就是我们的学术讨论往往脱离实际，使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听了不感兴趣。这一次就不同了，你不请他他也会自己要求参加了。

听说在最近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中，有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对我们的理论宣传有意见，说使他们的实际工作增加许多困难。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在前几天的报告中，就比较详细地说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之间的矛盾。我们说的往往是前途远景，而他们所考虑的是如何解决目前所存在的具体问题。所以我说做理论工作的同志应当看到当前的实际情况，不要把改革管理体制看得过于简单，不做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很难进行经济管理体制的彻底改革。另一方面，我也奉劝做实际工作的同志把目光放大一点，看远一点，认识不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就不可能有高速度，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把问题说清楚了，大家就能想到一处去了。前些时候孙冶方同志在经委学习会的一次报告中说“物资部可以取消”，物资部的同志很伤脑筋。当我请他们来讨论如何改革物资管理体制时候，他们就说物资管理工作必须加强，不能削弱辩护。我说目前确实需要加强物资管理，原因是物资供应有很大的缺口。到供求大体平衡时候，必须改革管理体制。你们有不同的意见，也可以写文章，我保证你们在内部刊物发表。现在冶方同志也已经声明，他说的取消

物资管理部，是说改革物资管理体制的结果，并不是说现在就要取消物资部，双方的意见就比较接近了。因此，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在一起共同讨论，十分必要，必须改变过去“风马牛不相及”的现象。

毛泽东同志历来是主张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他在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说：看起来这本书是反映了这样的情况：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没有概念、规律这一套，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这两种人没有结合起来，也就是说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苏联的情况是如此，过去我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在社会科学院刚成立的时候，我曾去看胡乔木同志，说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理论工作者和经济实践的结合，远远不如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经济研究机关，是由垄断资本集团出钱创办的，它们都要为垄断资本集团服务。即使是政府出钱创办的研究机关，也必须向政府献计献策。所以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很熟悉经济情况。我国的经济理论研究机构过去同经济工作部门很少来往，连统计资料都看不到，要到外国的书本上去找中国的统计数字，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乔木同志说我提的问题很重要，可是问题太大，他也解决不了。现在，我看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有了一个共同的任务，就是为四个现代化服务。我们这一次会议，为共同研究如何为着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学风，为什么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不能发扬呢？这里也有一个体制改革问题，值得好好研究。现在社会科学院的几个经济研究

所同各经济部门的研究所互相挂钩，社会科学院召开的双周座谈会，就常常请各经济部门的同志去发言。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也常常请各经济部门做研究工作的同志来座谈。我们几个经济研究所的联系很密切，常常共同研究，共同讨论，有好的材料互相交换，闹文化大革命以前是不一样了。我不知道各省的情况怎样，想来一定也有进步。不能满足于现在的情况，还应当想出各种办法来加强联系，继续前进。我历来是做实际工作的，因为关心理论研究，深深懂得理论工作者的困难处境，确实是患了“营养不良”症，需要经济部门多供给一些经济资料，包括统计资料在内。经济部门天天忙于实际工作，很少理论研究，也确实患了“消化不良”症，要请理论研究机关多多帮助。

为着理论结合实际，希望在这次会议以后，大家选择几个在讨论中提出的重要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自然科学可以在研究室中进行试验，社会科学的研究室是在大门外面，必须走出大门进行社会调查。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当然是很重要的，但为解决现实问题，我们只能从经典著作中学习研究方法，不可能去找具体答案。要找具体答案，特别是要研究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中国式的现代化，就非调查研究中国的社会情况不可。现在我们研究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或者研究如何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都不可能从经典著作中找到答案，只能依靠对中国的现实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这里面也包括对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当然，更加重要的是目前的情况，选择上中下三种典型，进行比较研究。我研究经济理论就是靠调查研究起家的，三十年代起就进行农村调查，研究中国

农村经济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研究国民经济的全面情况，研究的问题比较广泛。我做报告，写文章，总是针对着经济工作中的需要，有的放矢。当然，我也不反对解释经典著作的纯理论的研究，但是我认为应当把较大的力量转移到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方面来。

进行调查研究，最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从调查所得到的实际材料中去找得出结论，决不能先有结论再去找实际材料。多年来有一种很坏的风气，就是根据领导者的意图去找调查资料。实际情况总有好坏两个方面，有些同志做调查，要肯定它，就只找好的方面；要否定它，就只找坏的方面。记得1959年上海学术讨论会时，武汉大学的同志告诉我，他们听到陈伯达说成立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就要消灭，如获至宝，急忙组织二三百个教员学生，做了二三个月的调查，写出一个商品生产即将消亡的报告。报告还没有出笼，就听到毛主席对商品消亡论的批评，立即把报告销毁。我说销毁太可惜了，留着很有用处，可以从中找出今后怎样做调查研究的宝贵经验。在开幕词中我提醒大家发言要防止随风倒，做调查研究工作更应当防止随风倒，这不是科学家的态度，说得难听一点是市侩作风。科学家不应当看风驶舵，有时候要根据调查资料，提出一些领导者还没有注意到的重大问题，甚至与领导者不同的意见。这种调查研究，才真正对领导者有好处，可以使领导者少犯错误。如果看领导者的眼色办事，要白有白，要黑有黑，这是一害国家，二害领导者，三害自己，比不调查更坏。

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当然也要多做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必须从全局出发，反对本位主义。我建议不要专找自己系统进行调查，而要多找对立面，例如找自己产品的销售对象去